

# 从张衡《东京赋》看东汉都城洛阳的城市建设\*

徐丹莉, 曾广开

(湖北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以张衡《东京赋》所描绘的洛阳城市建筑为依据,着重从都市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东汉立都洛阳的原因和洛阳城市建设的特点。

**关键词:**张衡《东京赋》洛阳 城市建设

**中图分类号:** K921/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730(2001)01-0015-05

东汉时期,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当时人口密度最大、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大都市。张衡的《东京赋》,从文学角度对京城洛阳的繁盛做了精彩的描绘。我们试从都市文化的角度来解读《东京赋》,力求从中发现洛阳城市建设的特点。

项羽而受沛。彼偏据而规小,岂如宅中而图大。秦朝以函谷关和武关作为屏障,但还是不能阻止项羽的军队从函谷关进入和刘邦的军队从武关进入。可见:秦偏据关西,所规近在二关之内,故云小也。岂如东京居天地之中,所图者四海之外。(薛综注)

东汉时期选择洛阳作为都城,除了当时特定的政治、军事原因外,最为直接的原因却是依赖于洛阳城方圆的地理环境。洛阳被宠于手心,青山作帐,绿水为眸,天姿绰约,为天下所钟。

## 先讲水文

《东京赋》一言以概之:“汭洛背河,左伊右”简单的八个字,即含有八个意思,可谓是字字如金,不仅指出了与洛阳相关的主要河流,而且描绘了它们的大体方位。洛阳城面向洛水,背对黄河,洛水又入于黄河,因而洛水为自西而东、西低东高走向。从平面图判断,顺水而行,洛水居中,左伊右,则是伊水在下,水在上。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县”下曰:“洛水在县北四里,伊水在县东南十八里,水在县西北六十里。”以河南县(今洛阳县)为参照,其相对位置一目了然。

考其源流,洛水之源有三种不同的记载。一曰冢岭山。《尚书·禹贡》曰:“洛水出冢岭山东北,至巩入河,过郡二,行千七十里。”胡谓《禹贡锥指》曰:“过郡二,弘农、河南。”又曰:“洛水自河南故城南,又东北迳洛阳县东南,又东至洛阳县故城,会伊水,又东迳偃师县南,又东迳巩县故城南,又东北至洛口入河。”二曰欢举山。托名汉代桑钦的《水经·洛水篇》曰:“洛水出上洛县欢举山。”郦道元《水经注》引《山海经》曰:“出上洛西山。”欢举之山,洛水出焉,东与丹水合,水出西北竹山,东南流注于洛。《山海经·海内东经》曰:“洛水出上洛西山,东北注河,入成皋之西。”洛水出自欢举山的记载今本

古代的洛阳,具有成为都城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适宜的气候条件。西周初年,周公旦营建洛邑,分为二城。一为王城,二为成周。《尚书·洛诰》曰:“卜涧水东,水西,惟洛食。”又卜“水东,亦惟洛阳。”正如张衡《东京赋》所说:“昔先生之经邑也,掩观九,靡地不营。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总风雨之所交,然后建以王城。”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阳在当时居天下之中,四季最为分明,二十四节气的划分也最适宜洛阳地区。特别是每至春分、秋分之时,白昼与黑夜的长短比例恰好处于一年的正中间。所以,东周初年,周平王东迁,以王城为都城。战国时期,秦国逐渐强盛,周室渐渐衰微,洛阳实际上已失去都城的地位。秦庄襄王元年,秦国灭掉东周,以洛阳十万户封相国吕不韦为文信侯。可见到了战国末期,洛阳虽说历经战火洗劫,仍然是一个经济繁荣、人口众多的都市。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定都于洛阳,洛阳因成周故城遗址而扩大,成为东汉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括地志》曰:洛阳故城,在洛阳县东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筑,即成周也。《晋太康地道记》记载,洛阳故城方圆四十里。又河南尹下属有洛阳县,县治设在洛阳城内。所以,东汉时期的都城洛阳,实际包括洛阳县在内的较大的区域。张衡《东京赋》论及定都洛阳的作用时,与秦朝相比较:“秦负阻于二关,卒开

\* 收稿日期 2000-05-30

作者简介:徐丹莉(1976-),女,湖北咸宁人,湖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曾广开(1957-),男,河南开封人,湖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山海经》已佚。三曰熊耳山。晋张华《博物志》曰：“洛出熊耳，盖开其源者也。”胡谓《禹贡锥指》云：“熊耳山在今卢氏县西南五十里。《汉书·地理志》上洛县下曰：‘熊耳获举山在东北，是上洛县亦有熊耳也。’三种记载文字不同，所记地理方位并无差异。近人高步瀛认为《山海经》所说“欢举”是“获举”之误，清代著名学者毕沅、郝懿行注《山海经》，认为冢岭山就是欢举山。刘昭注《续汉书·地理志》说得明白：“陕西商县洛南县，以訖河南卢氏县，连山绵亘，皆出秦岭。冢岭、熊耳乃随此异名。”由此可知，洛水出自属于秦岭山脉的洛南县冢岭山。

《水经·伊水篇》曰：“伊水出南阳县西蔓渠山。……又东北至洛阳县南，北入于洛。《山海经·中山经》曰：‘蔓渠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箭竹，伊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洛。’胡谓曰：‘蔓渠山在今卢氏县东南，盖即熊耳之支峰也。《河南府志》曰：‘伊水出郭落山。’由此可知，洛水出熊耳山之上流，伊水出熊耳山之下流。

《水经·水篇》曰：“水出河南谷城县北山。《大清一统志》曰：‘河南河南府，水源出孟津县，西流至洛阳西北，又东南流入洛。’又曰：‘谷城山在孟津县西六十里，水出此。’

洛水、伊水、水三条河流永恒流动的态势，促使洛阳不断地新陈代谢，兼容并蓄，永葆青春。洛水、伊水、水三大水系贯穿洛阳，与洛阳邻近的州县通过水路互相勾连，形成一个水上交通网，东西南北，四通八达，水运成为洛阳城市运转的重要枢纽。水运的发达，不仅有利于农业灌溉，在古代洛阳陆地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水运成为最便利的选择，对于洛阳的城市建设起着巨大的作用。洛宁的竹子、卢氏的木材，皆由洛河结筏装运而下，输入洛阳。而豫西的土产，又可由水运东达巩县，并由黄河转运东售。洛阳宫殿建设所需要的原材料，宫廷陈列所需的大量工艺品，大部分产自洛阳地区及其附近州县，通过洛水、伊水、水运抵洛阳，而非远郡贡品所能满足。此外，纵横交织的水运网，让宫苑山水园林的配置随处点染，波光 and 涟漪的微笑，洋溢着城市灵气与秀美的情韵。

### 再来看群山

洛阳是一个群山拥抱的城市，山多且险。张衡《东京赋》曰：“汭洛背河，左伊右，西阻九阿，东门于旋。盟津达其后，太谷通其前。回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轘。大室作镇，揭以熊耳。底柱辘流，磻以大。”赋中简要论述了洛阳四周的山脉，大致如下：

九曲坂在洛阳的西面。“西阻九阿”句，《文选》李善注曰：“阿，曲也。所谓‘九阿’，即九曲坂，又叫九曲山、大山，在今荥阳县汜水镇西北。李善注引《穆天子传》曰：‘天子西升九阿。’酈道元《水经注·洛水篇》曰：‘洛水东迳九曲南，其地十里。《穆天子传》所谓天子西征，升于九阿，此是也。洛水又东与豪水会，水出新安县密山，南流至九曲东，而南流入于洛，洛水之侧，有石墨山，山石尽黑，可以书疏，故以石墨名山矣。’胡绍煊《述征记》：‘黄卷坂者，傍绝涧以升。潼关长坂，十余里九坂，皆迤邐长坂。《东京赋》所谓‘西阻九阿’是也。然则九阿即九曲坂矣。’又戴延之《西征记》曰：‘黄坂去终南六十里，少华山西。少华山在秦岭，则九阿在洛阳西。’

旋门坂在洛阳的东面，在成皋县（今荥阳县西汜水镇）西南数十里。《水经·河水五》：“河水东迳旋门坂北”。酈道元注曰：“今成皋西大坂者是也。升陟北坂而东趋成皋也。”曹大家《东征赋》曰：“望洛河之交流，看成皋之旋门。”《文选》李善注曰：“河南郡有成皋县……今虎牢（关）是也。”

盟津在洛阳的北面。盟津，即孟津。“盟津达其后”句，《文选》李善注曰：“孟津，四渎之长。故武王为诸侯约誓于其上。《尚书》曰：‘东至于盟津。’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凑。古今以为津。”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偃师县“下曰：‘孟津，在县西北三十一里，北邙山在县北二里，自洛阳县界东入巩县界。’”据此，可知邙山横贯其境的孟津在洛阳的北面。

太谷在洛阳的南面。《文选》李善注引《洛阳记》曰：“太谷，洛城南五十里，旧名通谷。《方輿纪要》曰：‘太谷在河南府东南五十里，亦曰大谷口。灵帝时八关之一也。’《后汉书·董卓传》注曰：‘大谷口在故嵩阳西北三十五里，北出对洛阳故城。’《元和郡县图志》曰：‘太谷故关，在颍阳县西北四十五里。’《大清一统志》则引作洛阳县东南五十里。诸家所言，均说明太谷在洛阳东南。

伊阙在洛阳的西南。《元和郡县图志》曰：“伊阙山在伊阙县北四十五里，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流其间，故名。”《左传》杜预注“伊阙”曰：“洛西南阙口是也。”可见伊阙在洛阳西南。伊阙是沿着大道进入洛阳的必经之处，迂回而远，故《东京赋》曰：“回行道乎伊阙。”

轘山在洛阳的西北。李善引《汉书》沛公从轘“句薛综注曰：‘坂，十二曲道也。将去复还，故曰轘。’《元和郡县图志》曰：‘轘山，在缑氏县东南四十六里。’《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乐盈过周，王使候出诸轘。’杜预注曰：‘缑氏县东南有轘关，道路险隘，凡十二曲，将去复还，故曰轘。’缑氏县，西北至河南府（洛阳）六十三里，故轘山在洛阳西北。从西北进入洛阳，轘山山路险峻，但路途较短，是进入洛阳的捷径，故《东京赋》曰：“邪径捷乎轘。”

大室，即今嵩山的太室山，在今登封县境内，位于洛阳东南。《文选》李善注曰：“嵩高别名也。《元和郡县图志》登封县曰：‘嵩高山，在县北八里。亦名外方山。又云东曰太室，西曰少室，嵩高总名，即中岳也。山高二十里，周回一百三十里。’嵩山为中岳，在洛阳一带是海拔最高的山峰，从汉武帝起就开始封禅祭祀，所以“作镇”是东汉都城洛阳的镇国之山。

熊耳山，横贯今河南省卢氏县境内，在洛阳的西南，是伊水的发源地。唐李白《明堂赋》曾借用张衡《东京赋》“揭以熊耳”之句，云：“远则标熊耳以作揭，豁龙门以开关。”

底柱，即砥柱山，汉代以来又称三门山，在洛阳的西面。《元和郡县图志》陕县曰：“砥柱山，俗名三门山，在县东北五十里黄河中。《禹贡》曰：‘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东至砥柱。’河水分流包山，山见水中，若柱然也。又以禹理洪水，山陵当水者，破之以通河。三穿既决，河出其间，又似于门，故亦谓之三门。”陕州（治所在陕县），东至洛阳三百五十里，则砥柱山在洛阳的西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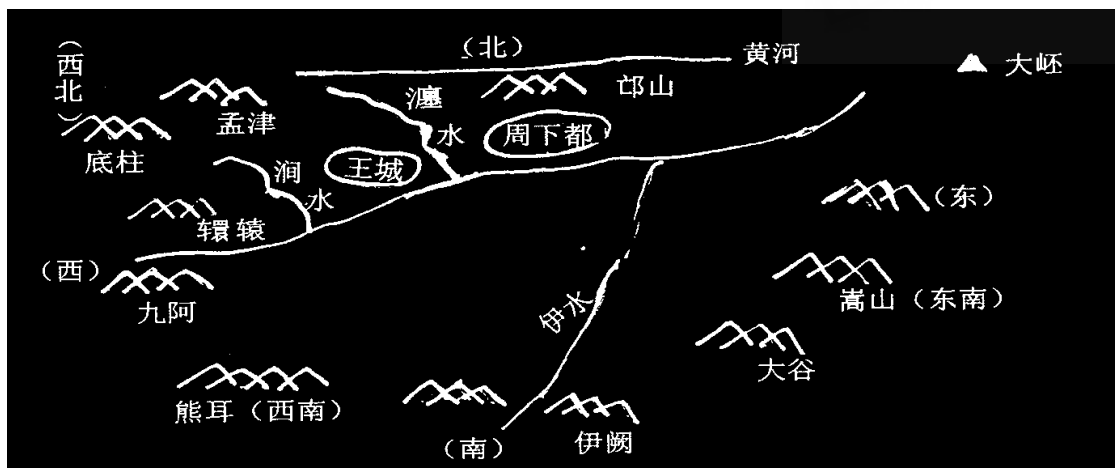
大山，又叫九曲山、大邳山、大伾山，见上文有关“九曲坂”的论述。近人高步瀛认为大不是山名，而是地名，疑误。《东京赋》所谓“磻以大”，是形容其险峻如同利剑。

“鐔”《说文》指“剑鼻”，李善注为“剑口”；言大之险，同乎剑口也”。

以上为洛阳地区的山势。洛阳四面环山，且险怪奇绝。或九曲回肠，或剑拔弩张，或为要塞，或为天堑。《元和郡县图志》论及古代中国的地势时引《左传》曰：“四岳、三涂、阳城、大室，九州之险。”洛阳位于大室之旁，正是古往今来的险要之处。《后汉书·灵帝纪》注曰：“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置八关都尉官。此八关谓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旋门、小平津、孟津也。”可见，东汉时期洛阳一带有八道险关，《东京赋》所言居八关之五。另外函谷、广成、小平津三关，亦在洛阳附近。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县境内。《元和郡县图志》引《西征记》曰：“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劣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崖上柏树

荫谷中，殆不见日。关去长安四百里。日入则闭，鸡鸣则开，秦法也。东自崑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所谓‘秦得百二也’。函谷关在洛阳的西面，是进入关中平原的天险，反过来说，也是关中平原通向洛阳一带的关隘。广成，即广城关，在今临汝县西。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东汉时期的广成是一个方圆一百多里的大泽，建城设关，自然也是拱卫京师洛阳的险阻。小平津，在今巩县西北。《郡国志》曰：“陝州平陆县小平津，张让劫献帝处南岸。”关隘要塞，易守难攻，一般是不愿放弃的，张让因劫持皇帝，担心勤王之师围攻，只好出此下策，放弃要塞，逃到他处。《后汉书·灵帝纪》亦曰：“让、等复劫少帝陈留王，走小平津。”

综上所述，则洛阳水文地理之大概，如下图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洛阳的邻县如偃师、巩县、缑氏、成皋、孟津等，均有大山临境，而洛阳境内却坦坦荡荡并无一山，洛阳因而地处盆地而温暖湿润，洛水亦因此被称为温洛，即使是寒冬季节，流水依然。可以想见，洛阳这样的地势，在东汉时期陆路交通是极不发达的，而洛阳的水运，虽然极为便利，却不得不受时节限制。洛水的走势成爬坡状，倾斜甚急，遇夏秋山洪爆发之际，水势如脱缰之马，奔泻泛滥，席卷村舍，沉没船只，冲毁宫殿，实为大患。从周朝到民国，灾情不断。总体而言，洛阳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城市，却恰恰为统治者提供偏安一隅且山青水秀的独好之处。作为政治中心，处在形式的封闭必然会推进内在精神的丰富与开放，吸纳每一次外来的文明，培养出对文化的敏感的嗅觉。这种思想的繁荣让每一次文化的补给为城市自身的发展又提供了契机。城市的建设虽然迎合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但从客观上代表了一个朝代的整体气质与内蕴。一旦它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它的文化精神却不会很快随之消失，却是源远流长。

之陋，帝已讥其泰而弗康。”奢未及侈，俭而不陋。规遵王度，动中得趣。于是观礼，礼举仪具。经始勿亟，成之不日，犹谓为之者劳，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事实上，东汉的都城洛阳也是极为富丽与繁荣的。汉赋以大为美的风尚，与洛阳城市建筑呈现的宏伟壮美，从本质上都体现了那个时代因中兴而焕发出来的繁富却豪放的气质。

东汉时期的洛阳城为南北走向，较周朝下都有所扩大。《帝王世纪》记载：“（洛阳）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元康地道记》曰：“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三十六步。《元和郡县图志》引华延隽《洛阳记》曰：“洛阳城东西七里，南北九里。洛阳城内宫殿、台观、府藏、寺舍，凡有一万一千二百一十九间。《洛阳县志》亦云：“大城东西七里，南北十余里。”诸家所言，差别不大。洛阳城南北走向的格局为魏晋统治者所沿袭，至唐代始有改变。唐代东都洛阳城基本呈正方形，城市街道坊市，等分有序，极为规矩，规模也比较宏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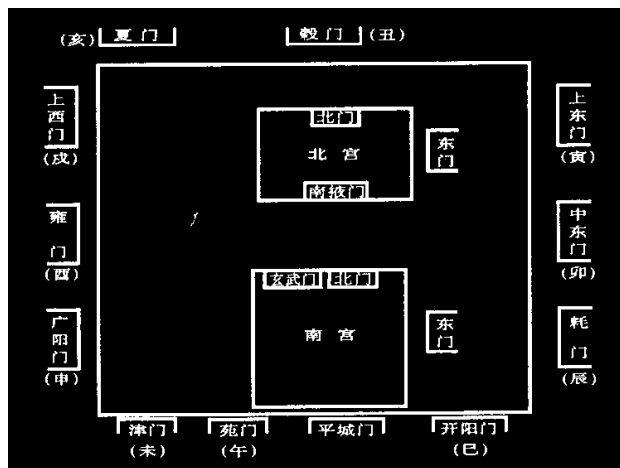
东汉时期的洛阳城，共有十二座城门。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洛阳有城门十二，每门有侯一人，属城门校尉所辖。又设司马职一人，主兵。城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司马一人，千石；门候各六百石。他们守卫着洛阳的城门，负责京师的安全。

洛阳城的南面有四门。正南一门为平城门，位最尊，与南宫相连，天子每郊祀出巡，皆从此出，故此门不设侯，设屯司马，俸禄与城门校尉相同，为二千石。平城门东为开阳门。应劭《汉官》曰：“开阳门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来在楼上。

班固、张衡都曾以洛阳与长安的城市建设相比较，借以说明洛阳的特点，主张道德之富，反对宫廷豪奢。班固《东都赋》曰：“于是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能逾，俭不能侈。”张衡《东京赋》亦曰：“是以西匠营宫，目玩阿房。规摹逾溢，不度不减。损之又损，然尚过于周堂。观者狭而谓

琅琊开阳县上言,县南城一门柱飞去。光武皇帝使来识视,怅然。遂坚缚之,刻记其年月,因以名焉。”平城门的西边为苑门,又称小苑门。小苑门的西边则为津门。洛阳城的东面有三门,由南至北,依次为耗门、中东门、上东门。惠栋曰:“汉旧仪册皇子为诸侯王,皆于上东门中。”洛阳城的北面有二门。谷门处中位,谷门的西边是夏门。洛阳城的西面有三门。最北为上西门,以丹漆镂之;中为雍门,南为广阳门。洛阳城的十二座城门是依月令和五行学说,根据十二辰的方位来设置的,将“未”定在西南上的津门,除宫门平城门阙位外,其余城门按顺时针方向从西至南依次占位为:申(广阳门)、酉(雍门)、戌(上西门)、亥(夏门)、丑(谷门)、寅(上东门)、卯(中东门)、辰(耗门)、巳(平阳门)、午(苑门)。

洛阳有南北宫,相当于后世的皇城和宫城。惠栋曰:“案东京有南北宫,相去七里,中央作大道,复道三道。天子从中道,从宫夹左右,十步一卫。南北宫亦各有宫门。”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洛阳南北宫各设卫士令一人,均六百石。宫掖门每门设司马一人,千石。南宫为皇城,共有四门。正南为平城门,由南屯司马主之。正东为东门,由苍龙司马主之。正北为北门,由北屯司马主之。北门西边为玄武门,由玄武司马主之。北宫为宫城,共有三门。朱燔司马主南掖门,东明司马主东门,朔平司马主北门。凡居宫中的官员,均有口籍,以属官之名两字造铁印,作为出入宫城的凭证。综上所述,洛阳城诸门的方位如下图所示:



根据这张洛阳城门的方位图,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东汉建都洛阳的历史原因,而且可以进一步考察洛阳城宫殿建筑的特点。据史书记载,洛阳著名的宫殿有近50座。《后汉书·郡国志》洛阳下《注》曰:“南宫有玉堂前后殿、却非殿、宣室殿、嘉德殿、崇德殿、云台殿、九龙殿、广德殿、安福殿、合欢殿、铜马殿、敬法殿、清凉殿、凤凰殿、翔平殿、竹殿、黄龙千秋万岁殿、又侍中寺、中黄门寺、画室署、丙署、云台、台,皆在南宫。北宫有德阳殿、章德殿、章德前殿、宣明殿、温明殿、含德殿、天禄殿、寿安殿、迎春殿、永宁殿、温飨殿、章台殿、章台下殿、又蚕室、掖庭、永巷署、翔平署、增喜观、九子坊,皆在北宫。东观在南宫,白虎观在北宫。尚书阙在南宫,尚方在北宫。”又曰:“尚书省在神仙门内,太尉司徒司空府,开阳城门外。司徒府中又百官朝会殿。”列举宫殿约47种,与《洛阳记》所述相去甚远。但据此与《东京赋》相对照,可知《东京赋》所述确属可信。

南宫正殿为却非殿。《后汉书·武帝纪》曰:“(建武元年)

冬十二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建武十四年正月,起南宫前殿,正殿遂改。又崇德殿,《东京赋》曰:“乃新崇德,遂作德阳。”《文选》李善注曰:“崇德在东,德阳在西,相去五十步。此说与《郡国志》德记载不符。”《后汉书·和帝纪》曰:“八月辛亥,帝崩,癸丑殓于崇德前殿。”《安帝纪》亦曰:“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据《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崇德殿为便殿。

《东京赋》中所提及南宫诸殿,有前殿、云台、合欢、安福、九龙、嘉德。《东京赋》曰:“于南则前殿灵台,合欢安福。”九龙(周殿名)之内,曰嘉德(殿名)。“灵台,即云台。”《后汉书·五行志》曰:“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宫云台灾。”又:“延熹八年,南宫长秋、合欢殿后钩盾、掖庭朔平署各火。”《文选》注“九龙”曰:“本周时殿名,门上有三铜柱,柱有三龙相札绕,故曰九龙。嘉德殿在九龙门内。”《后汉书·皇后纪》曰:“孝仁皇后居南宫嘉德殿。”

北宫正殿为德阳殿。《后汉书·明帝纪》曰:“永平三年起北宫,八年冬十一月,北宫成。”德阳殿乃天子临朝,宴飨百官,明辨朝仪之殿,所以最为华丽。《钟离意传》曰:“德阳殿成,百官大会。”李尤《德阳殿铭》曰:“大汉体天,承以德阳,崇高宏丽,包受万方。内总朝贡,外供避荒。”《艺文类聚·居处部》引《汉官典职》曰:“德阳殿周旋客万人,激洛水于殿下。”蔡估《汉议》曰:“(德阳殿)陛高三丈,皆文石作坛。”又曰:“书屋朱梁,玉阶金柱,刻镂作宫掖之好,厠以青翡翠。一柱三帝,韶以赤缇。”《洛阳宫阁簿》曰:“德阳宫殿南北行七丈,东西行三十七丈四。”《后汉书·百官志》《秋官·朝士》曰:“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者。天子外朝一者,即朝士所掌者是也。内朝二者,司士所掌正朝,太仆所掌路寝朝是二也。”德阳殿阔大华美,尽显天子位权高于万民之上的气势,为内朝一。德阳殿后宣明殿,为内朝时引见群臣之殿,为内朝二。另南宫中百官朝会殿,为外朝。《后汉书·百官志》注曰:“司徒府与苍龙阙对,厌于尊者不敢号府。”又曰:“国每有大仪,天子车驾亲幸其殿。”干宝注曰:“礼,司徒府中有百官朝会殿,天子与丞相决大事,是外朝之存者。”

北宫多便殿。《后汉书·灵帝纪》曰:“五年春五月庚申,永乐宫署灾。”注曰:“德阳前殿西北入门内,永乐太后宫署灾。”《东京赋》中多有记述:“其内则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飨迎春,寿安永宁。”《后汉书·鲁恭传》曰:“永元九年八月,饮酣,齐会章台。”《马防传》曰:“肃宗亲御章台下殿。”《东京赋》又曰:“永安离宫,修竹冬青。”姚鼐引《续汉志》曰:“永安,北宫东北别小宫名,有阁观。”《玉梅》曰:“永安宫周围六百九十八步,东北别有小宫园池。”《东京赋》又曰:“濯龙芳林,九谷八溪。”《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宫中设有濯龙监,刘昭注曰:“濯龙有币帛金银诸货物。”又置永平署,永巷令一人,典官婢侍使,尚方尚方令一人,作御用刀剑等器物,掖庭,后宫所处,掖庭令一人,为宦官,掌后宫贵人采女事。又《明帝纪》曰:“北宫成,丙子临辟雍,养三老五更,礼毕,诏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其大逆无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蚕室为冷宫,冬天储藏冰凌,以供天热消暑时所需。由此可知,北宫为皇宫的生活区,是皇帝、嫔妃及子女的居所。

洛阳的城门、宫门以五行来定位,殿门亦循此例。经学虽为汉学之蔚为大观者,但东汉的文化思想中却以阴阳五行

说最为流行,被视为宗教、政治、学术的骨干,统辖时令、方向、神灵、法律、服色、臭味、道德,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东汉时期洛阳宫殿建筑严格按照五行方位建造。属于木的一定居东,属于火的一定居南,属于土的一定居中,属于金的一定居西,属于水的一定居北。少阴为西,太阳为北,少阳为东,太阳为南。《东京赋》曰:“昭仁惠于崇贤,抗义声于金商。飞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文选》注曰:“崇贤,东门名也。谓东方为木,主仁,如春以生万物,昭天子仁惠之德,故立崇贤门于东也。西为金,主义,音为商,若秋气之杀万物,抗天子德义之声,故立金商门于西。”又:“神虎,金兽也。云从龙,为木兽春路。”据此可知,崇贤、金商为崇德殿门,云龙、神虎为德阳殿门。

东汉宫殿建筑中,最能体现五行学说的是明堂、辟雍和灵台。据《后汉书·郊祀志》:“明堂者,政教之堂”;“辟雍,之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灵台,天子所观天人之际、阴阳之令也。”“对这些有关教化、政德的祭祀建筑,班固《东都赋》和张衡《东京赋》极力铺陈其典雅华美,歌颂东汉王朝的德政。《东都赋》曰:“于是荐三牺,礼神祇,怀百灵,觐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徵。”《东京赋》亦曰:“乃营三宫,布教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灵台。”

明堂,在平城门外二里。《后汉书·武帝纪》刘昭注曰:“天子出从平城门,先历明堂,乃至郊祀。明堂的建造,起自周朝。《艺文类聚·礼部》引《周书》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牖高三尺,门方十六尺。东方曰青阳,西方曰总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庙。”东汉时明堂的规制,与周朝制度不同。《后汉书·郊祀志》刘昭注“明堂”曰:“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宇文愷引《礼图》曰:“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圆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时之主。室有二户,二九一十八,法土王十八月。内堂正坛高三尺,土阶三等。”两说稍有差异,但俱为依据五行学说加以阐释。辟雍,位于明堂左侧,距离约三百步。何谓“辟雍”?《白虎通义·辟雍篇》曰:“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为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雍之为言雍也,雍天下之仪则。”灵台,位于明堂右侧,距离也是三百步。东汉时期,明堂、辟雍、灵台是皇家举行祭祀、宣布教化的场所。《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免冠、衣裳、玉佩、绶履以行事。礼毕,登灵台……望元气,吹时律,观物变。”三月,临辟雍,初行大射礼。”冬十月壬子,初行养老礼。”三年春正月癸巳,诏曰:“朕奉郊祀,登灵台,见史官,正仪度。”刘昭

注曰:“仪为浑仪,以铜为之,置之灵台,王者正天文之器也。度谓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史官即太史,掌天文之官也。”可见,辟雍是皇帝行射礼等仪礼的场所,灵台上安放张衡发明的浑天仪,乃观天象正闰朔之所。张衡在京师洛阳应该是参与过这些祭祀活动,故其《东京赋》详细地描绘了皇家祭祀时的盛大场面:“宗上帝于明堂,推光武以作配……万舞奕奕,钟鼓喤喤。灵祖皇考,来顾来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春日载阳,合射辟雍……礼事展,乐物具。王夏阁,韶虞奏……执釜刀以袒割,奉觞豆于国叟。降至尊以训恭,送迎拜乎三寿。敬慎威仪,使民不偷。我有嘉宾,其乐愉愉。声教布护,盈溢天区。”

东汉时期学术发达,尤为重视对士人的教育。班固《东都赋》曰:“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韶德咏仁。”洛阳的教育,自然是优于其他地区。东汉中兴以后,在洛阳设太学教授儒生。《后汉书·武帝纪》曰:“建元元年幸鲁,初起太学。”陆机《洛阳记》曰:“太学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去宫八里,讲堂长一丈广三丈。”《后汉书·儒林传》记载:“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袒割辟雍之上,养三老五更。饷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围桥而观听者,盖以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文教之盛,远过前朝。另外,朝廷还设有武学。《东京赋》曰:“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平乐观是帝王阅兵之所。张衡在《东京赋》中详细描述了汉明帝狩猎讲武的场面:“岁惟仲冬,大阅西园。虞人掌焉,先期戎事……乃御小戎,抚轻轩,中畋四牡,既倍且闲。戈矛如林,牙旗缤纷。迺上林,结徒营……陈师鞠旅,教达禁成。火列具举,武士星敷。鹅鹳鱼丽,箕张翼舒。轨坐掩远,匪疾匪徐。馭不诡遇,射不剪毛。”班固《东都赋》亦曰:“若乃顺时节而狩,简车徒以讲武。”君王的狩猎,实际上也是对农兵合一的百姓时行军事训练,教他们演习阵法。

综上所述,洛阳城市设施,包括宫殿、官署、市集、佛寺、馆阁、猎苑,不仅全面,而且十分符合现代城市的规划原则。譬如城市的中心为日常生活区,而游乐场多在郊外。最重要的是,城市基础建筑处处体现了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和经学的痕迹。人们常说建筑是流动的音乐,而东汉洛阳的建筑却是流动的学术。两者的结合,文化注入每一个建筑群的布局,甚至注入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屋檐,文化与建筑交相辉映,形成了古都永久的魅力。

[责任编辑 赵永建]